

对话



一万里,上长江

□刘醒龙 张屏

李白眼里的长江,是“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杜甫望去的长江,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从青藏高原的格拉丹东到上海崇明岛,这条大河奔涌了一万多里。古人只能遥望,今人却能远行。溯流而上把这万里长江走遍,又该是什么况味?作家刘醒龙走了一万里,写了一万里,如今用他的新书作答:上上长江。

长江是条江,也是一个梦

张屏:“万里长江人文行走”活动2016年6月1日启程,2017年7月25日结束。这一年里,您和行走团队一起,将长江分为下游、中游、上游,源头分别走完,几乎走遍长江途经的所有重要人文水文景观,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决心去走?

刘醒龙:不用下决心,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对于中国人来说,长江是一种血脉,谁也绕不过去的。虽然长江流域广阔,从东到西,不经意间就能在这里、那里见到长江,感觉并不稀奇,可完整整整地沿着她去走、去看的人太少。更不用说我对长江有着特殊的情感。

我生在长江边的古城黄州,婴儿时期母亲曾不止一次在大堤上抱着我看过长江,可惜没长牙的婴儿是没有记忆的,但这段没有牙齿的经历一定在我的生命中留有痕迹。实际上,我从启蒙到上高中,之后走向社会,整个成长时期一直待在山区。但我与其他山里孩子不一样,走到哪里,都会对水有种特别的执著。只要有人提到黄州,只要听到别人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心里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

1976年,我20岁,再次回到黄州,专门跑到大堤上去看长江,这是有记忆的第一次见面,我有点犯傻:原来长江是这样的啊,她就在黄州城外,很近,城里都听得到码头的汽笛声,繁忙得很。1989年,我正式回到黄州时,长江上的动静,不仅黄州城里听不见了,就是站在长江大堤上也只能隐隐约约地听见。十几年间,长江主流一点点挪动,跑到鄂州那边去了,离黄州很远了。一条大河,竟然在眼皮底下离黄州城区而去,说不见就不见了。这样的变迁,只有长江才做得到,沧桑之事,要用沧桑来看才能看清楚。长江的境界,要将长江从头到尾看过了才有可能知道。

张屏:很多人很好奇,为什么要叫《上上长江》?

刘醒龙:这个念头是走到峡江上,从重庆往四

川宜宾去时产生的。一层意味是这次走长江是溯流而上,探索长江源的历程,就像在探索人从何而来;另一层意思,则有无上向往的意思。长江是河流中最高处的存在,走长江,我只能怀着仰望与敬畏。上上二字,还有至高无上的意味。

一程又一程,江边潮未平

张屏:一路上很多城市您之前都去过,这次把它们串起来的过程中,您得到了什么?在别人看来,作为第一个将万里长江走遍的作家,有没有获得一种自豪感?

刘醒龙:道路奔走、河流奔流的过程中总会产生文化结晶,城市就是许多文化结晶的结合体。从上海到武汉、从宜宾到石鼓、从玉树到曲麻莱,将不同的结晶体用脚步串起来,加上文学的介入,让我感觉到自己拥有一条完整而丰富的长江。这是十分值得庆幸的事,能将万里长江从头到尾走一遍的人,古往今来,确实没有多少。

或者还可以说,在文学史中,似乎我真的是将万里长江完整地行走了一遍的第一个作家。所以,我应当产生的不仅仅是自豪感,而是自己被自己吓了一跳。想不到一不小心,竟然抢了个头功。

张屏:在行走中,哪些地方给您留下特别深的感触?

刘醒龙:毫无疑问,首推是黄州,这是我的出生地。走完长江再回头看,尽管长江不是从黄州开始的,我对长江的理解却是从这儿开始的。对很多人来说,对长江的理解差不多来自三句诗: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还有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如果各占三分之一,我更倾向于苏东坡这个三分之一。从黄州往下,长江越来越浩荡;往上,长江越来越苍茫。李白的长江在黄鹤楼,杜甫的长江在瞿塘峡人口的夔门。长江之水向东流了一万里,一路上各种各样的事情,尽在这三句诗中。李杜的诗给了得,到苏东坡这里,那境界又高出一层。

第二个是镇江。北固山上留下了刘备招亲的故事,孙权的母亲、刘备的丈母娘可称作是中国最不起的丈母娘,她相中了女婿,连仗都不让打了,特别有人性。多一批这样的丈母娘,可不是家国民族的福气。再去紧挨着的金山寺,《西游记》里小玄奘漂流到这里被和尚救起,作者吴承恩也多次来这里,让人想起早先读书时发现的《西游记》中的笔误,文学之错或许只是千百万人的趣

谈,历史之错会使世间多出一番轮回。长江若犯了错又怎么样呢?天地若犯错更会如何?相比之下,文学真是一件小事,历史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一江洪水若是发错了癫狂,那才是万劫不复,连哭的机会都没有。这样层层想下去,很有意味。历史、人文、自然的变迁,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

第三个是石鼓。她也是一个节点,往上,金沙江越来越像一条小河;往下,她是一条大河。之前,金沙江、怒江、澜沧江三江并流,到了这里突然拐了180度大弯,从正南变为正北,万里长江第一湾带来了雄奇的虎跳峡。拐弯处的石鼓小镇却宁静得像是世外桃源。在我写长江的25篇文章里,留给石鼓的就有3篇。其实,还有第4篇,我非常想写,但没有写,不是不能写,也不是不敢写,之所以一个字也没有留下,是因为将这篇文章写在心里,或者说,有人已经将这篇文章写在石鼓镇外的那块大理石做成的纪念碑上。那天,我们即将进石鼓镇时,在江边停留了一会。无意中,我在荒草丛中发现一块没有任何文字的大理石纪念碑,碑座上放着一束鲜花。多年前,曾经有几位漂流勇士,在明知无法征服虎跳峡的情况下,仍义无反顾地乘用简陋的漂流器材冲向虎跳峡,除了江水和英勇,什么也没有留下。在纪念碑前,我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就像那块纪念碑,有些文章,不用写出来,反比写了更为经典。我不写自己无意之中遇上这纪念碑,还有一个原因:惭愧——与那些漂流金沙江的勇士相比,如今的行走太容易了。

最后是通天河。我遇到了狼,它从我们车前跑过,从右往左。看到它,我知道,我这一路对长江的认识就算是彻底完成了。在所有的知识中,狼以残忍、凶恶闻名;偏偏当地的藏族牧民觉得遇上狼是一种吉祥,当狼从你身前经过则是特别吉祥,当狼从你身前经过时是从右向左,那便是最吉祥了。这事看上去不可思议,但只要思路对了就会发现,一切的神秘,都出自日常人生中的不可或缺的道理。就像长江,最大的河,也是由小河汇集而成;再伟大的河流,如果不保护好,也会毁掉。尽管长江有一万多里,它所有的展示,都在我们的认知之中。

万里始回顾,文章夜撰成

张屏:行路难,写作更难吧?

刘醒龙:一路走来,我自己调侃是“新闻民工”,白天赶路,晚上交稿排版上报纸。经常是天黑了还没到住宿的酒店,一住下就开始赶稿子,往往写到凌晨一两点,清晨五六点起床,抓紧时间写

“一条大河,竟然在眼皮底下离黄州城区而去,说不见就不见了。这样的变迁,只有长江才做得到,沧桑之事,要用沧桑来看才能看清楚。长江的境界,要将长江从头到尾看过了才有可能知道。”



张屏:最艰苦的文字是在哪里写的?

刘醒龙:长江源那一段,玉树和曲麻莱。从西宁出发到玉树,路上开了十三四个小时,下午在海拔4600米左右的玛多县城吃晚饭时,高原反应已经有点厉害了,走路时觉得路面是软的,需要十分努力才能控制住自己身体的前倾后仰,不让自己显得东倒西歪。我多次到西藏,也去过珠峰大本营,从未有过对自己生命力的怀疑。在玛多吃完晚饭出来,到马路对面去上厕所的那段路,真的弄得我开始怀疑人生了。我害怕自己很难完成万里长江人文行走的最后一程,也是最关键的这一程。那天晚上11点到玉树,住下后还要干活写稿子;再往后到了海拔4500米左右的曲麻莱县城,实在太难受了,不得不打开氧气瓶,吸了点氧气后才发现,之前写的文章中有太多错别字。要命的是自己曾盯着这些错别字看了又看,竟然不知道它们全是错的。不过,也正是在曲麻莱睡的这一觉让我恢复了自信。第二天早上临出发时,随队医生为每个人查血氧和心率,一行人中我年纪最大,偏高还数我的血氧与心率最正常。我开玩笑说,这正是昨天下午遇见狼,还给我们的吉祥。

张屏:去沱沱河的途中遇到了青藏线大堵车,你把笔记本电脑拿出来搁腿上,车一停下来你就写一点;看您每天洋洋洒洒三四千字,时空交错中,各种故事信手拈来,实际情况一点也不潇洒。

刘醒龙:写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人生中有很多偶遇、体会、故事、传奇、传说,它们都在脑海里积淀着,需要一个契机激发。比如五四青年节,我们到了重庆江津,似乎冥冥之中注定,公路上偶然看到陈独秀故居的指示牌,果然一去之后很有感触,写起文章来也才思泉涌。

当然,必要的功课还是免不了要做。每到一地,只要有可能,一定要想办法弄到当地的县志、逛当地的博物馆。那里面藏的是文化的源流;去长江源前,我还特意在旧书网上买了当地的土地资源调查综合报告,自己研究不说,在西宁时,相关部门的领导见了都如获至宝。

■新作快评 兮舟短篇小说《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收获》2018年第1期

一只猫引发的蝴蝶效应

□赵振杰

的小猫,原本有一个同样文艺、高冷的名字“巴别尔”(《骑兵军》的作者),“我”由此推测失主是一位与自己趣味相投的“少数派”。有好事者建议调取小区监控,严办偷猫贼,事态变得愈发不可收拾,多次劝说小邵归还美短无果后,“我”最终决定带着小邵和猫逃离天通苑。

一路上,且停且行,漫无目的。百无聊赖之中,“我”上网充分了解了一下美短猫种的前世今生,并利用自己多年荒废的专业知识帮一名抓狂男修好了半道抛锚的汽车——似乎这并非一场狼狈不堪的“畏罪潜逃”,而更像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跳脱出固有的生活环境,让“我”对存在本身有了更为清醒的认知与思考。关于常识的“合理性”问题、理论与事实的差异性问题、“爱情”的保质期与耐受力问题,以及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紊乱症候群”……那些平日里习焉不察、见怪不怪的生活乱象和逻辑悖论,在渐行渐远的旅途中反而变得愈发的显豁清晰、耐人寻味:“在那座大城中,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的干着开饭馆的活儿,猫粮和干拌面一起摆在超市的货架上,人在微信群里满足着自己的虚荣心,刷手机刷出了腱鞘炎,许多人不敢生孩子所以只能养猫,失业者在回笼觉里继续承受着匍匐在地的梦魇。”

兮舟并没有将小说简化为一个仅仅关于“生活在别处”的理想化文本。“我”在寻找“诗与远方”的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眼前的苟且”的困扰。一如文中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要离开天通苑了,但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巴别尔”隐喻着少数派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而“天通苑”则意味着世俗生活逻辑中的最大公约数。无论“我”多么渴望像那只登上“五月花”号的流浪猫一样,漂洋过海去寻找新大陆,最后都难以逃脱被杂交培育成唯众取宠的观赏性宠物猫的厄运。“真正的生活”蓝图绘制得越美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龃龉和张力就越凸显、越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的题目《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中还蕴藏着另一重含义,即“孙悟空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评论

重凝大地的一脉深情

□李一鸣

故乡,每个人生身的地方,那片给予人生命与精神的土地,事实上已经成了每个生命个体的信仰。祖先生活过的土地,远离故土的人精神永恒的故园,无论是脚步的回返,抑或是精神的遥望,都仿佛一种意味深长的朝圣。故土于厉彦林而言,从来不是某种观察,甚至也不是体验,而是一种凝注大地的生命,因而才有了这对精神源头的不止回溯。

在故乡的土地,作者与那里的一切已然融为一体,在一个个难忘的瞬间,下意识地挣脱了钢筋水泥的生命重压与心灵羁绊,身心敞开如赤子,每个细胞都贴紧故乡的土地,直至心灵与故乡的山野草木、生长其间的父老乡亲默默融合,从而气血畅通,地气升腾。

而无疑,与之相应的是远离故土的日子,那些源自心底的惶惑不安,从不曾消失。如同失去信仰的人恒久的茫然无措与无着无落。人为生命个体,土地上的生灵,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深意。正如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所表述的“人是宗教的始端,中心点,宗教的尽头”,在故乡的土地上,在土地上的人们中间,作者在本能的沉思中,一次次抵达了精神的深处,从生命与心灵的多维视域,从下意识的怀想与乡愁,到当下语境中对故园对土地的深思,盈满心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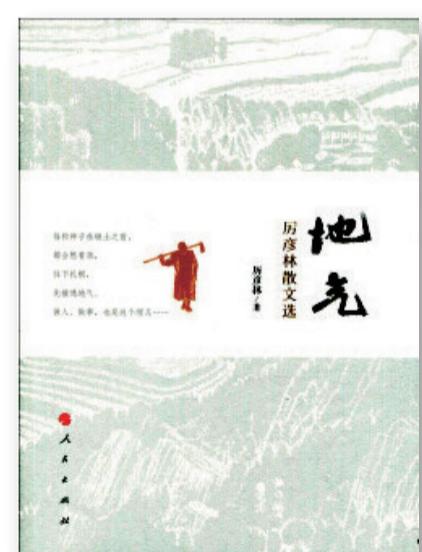
“出身乡村的人,记忆的底片上总叠印着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我的故乡沂蒙山区,那是一片贫瘠而肥沃的土地,是一片古老而英雄的土地”,“我自愿终生成为一位故乡的歌者”。那里,同样是给予人最初精神启蒙的古老而英雄的土地,祖先的生命源于此,确切地说,也许是祖先恒久不散的精神符号,结构出了每个人精神深处亘古的乡愁,使得生命对那片故土的回望变得意味深长,使得怀乡不再仅仅是一时的怀想与歌唱,而是某种使命般、信仰般深刻悠长:“土地像一首词,上阙是人类生存的空间,下阙是安放灵魂的栖所。”回

返故土,回到故乡去,从步履的回归到精神的皈依,这时的乡愁已不再是语义上的修辞,而是满怀一个生命的温度与质地,用理性的沉思与感性的本能建构而成的,是仿佛余光中“一枚小小邮票中的乡愁”,沈从文翠意悠然边城的乡愁,荷尔德林“毕生回报的乡愁”,塔可夫斯基长镜头中的乡愁,更是奥德修斯历尽艰辛执意回返伊卡塔的乡愁。

从某种意义上说,回到故乡,也仿佛回到庄严的母体之内,再次体味那片土地的温度、气息,以及与身心从未分离的命运。没有故土不令人欣慰,同样,没有故土不令人伤悲。那片寄寓着每个远行人的土地,有多少欢喜,就有多少绵长的哀伤。没有一个地方对个体生命的牵肠挂肚,比那里更深重,就仿佛我们的指纹和胎记,毕生相随,哪怕我们被世界如何重塑,哪怕我们经历了如何的结构与解构,惟乡愁亘古如一。

惟欢乐惟泪水在那片土地上的印痕亘古如一。汉乐府民歌曾有如斯吟唱:“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而事实上,悲歌果然可以当泣,而远望如何可以当归?渐行渐远的难离故土,丝丝缕缕的渴念,怎一个远望可以得了。厉彦林并未仅仅驻足于远望,在《地气》一书中,我们不难发现,相比于对故土的执意探寻与回望更为深远珍贵的,是作者经由对故土的炽情,进而自觉地对其外延进行观照,使生命成为精神价值的葆有者,而散文创作透过个体生命对故土的乡愁,呈现出的是对这片土地的更深层次的持久探寻,一个充满家国情怀的鲜明主题。

这样的写作主题,势必会使一个人对故土村庄的精神遥望不再仅仅是怀想、怀念与歌唱,而已然满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对土地环保、对乡村中国眼下结症与未来走向的隐忧,这样的忧患意识,是在当下享乐至上的语境中难能珍贵的,彰显着一个时代的写作者心中最朴素最深切的良知。



知。爱默生曾说过,“一个人怎样思想,就有怎样的生活”,而其间的生活,显然,阔大的精神内涵大于世俗意义:关于土地与经济、与政治、与法律、与文化、与伦理,那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土地问题也成了“血”与“火”的抗争,这广袤的土地,是一个大“魔方”,转动起来叫人眼花缭乱;是中国的一面“镜子”,折射着历史和现实的时空,叫人叹息不已……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如何逆势生存,保持自身特色,正是“乡土中国”的重大命题。

社会进程中的诸多现象,人类发展进程中必然遭遇的难题,不会豁免一个作家的精神使命。聂鲁达说:“祖国更重于生命,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土地。”厉彦林的精神指向,正与聂鲁达的认知不谋而合:“纵观人类膜拜土地数千年之后,伴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蒸汽、电力、信息等革命,使人类跪着的双膝慢慢地站起来,开始自信地征服世界,包括故乡的土地。然而,笑容还没有完全绽放,却又面临一系列生存危机与考验……陡然间人类才发现自己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地自私与渺小。”土地,我们生活于此的土地,亦是祖国,是人民,是一个历经万难正在崛起的华夏民族。人之命在于元气,国之命在人心,文学之命在地气。一个深怀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其作品无疑会弥散出艺术审美的庄严性。